

# 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辨识维度与遵循逻辑

张明军

**内容提要:**执政的核心问题是促使民众对执政主体拥护和支持的各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需要从本质维度(党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向权威的转化)、价值维度(执政理念与目标)、模式维度(执政与领导的复合)、能力维度(执政能力现代化)、绩效维度(成本—收益帕累托最优)等视角予以探析。党的执政规律的理念是遵循而非创设,遵循的核心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遵循的路径是坚持从执政的实然基础到应然目的,遵循的方式是坚持执政规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执政规律 辨识维度 遵循逻辑

执政规律是政党为实现长期执政或执政法定期限最大化所必须遵循的内在的、本质的、稳定的必然联系。此种必然联系在实践中体现为“政党在控制和行使政治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反映政党政治本质和必然性的法则和客观要求”<sup>①</sup>。政党所处的历史文化、社会基础和现实执政生态不同,决定了政党执政规律不仅具有一般的共性,同时亦涵盖了政党执政规律的特殊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角“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sup>②</sup>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对其执政规律探究的过程中,需要厘清执政规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对构成和影响执政诸种要素配置分析的基础上,从执政实践系统地、多维度探寻党的执政规律是走向执政真理彼岸的必然选择。

## 一、政党执政规律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善于把握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必须具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任何政党要取得执政成效,都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sup>③</sup>。“规律是事物发展中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sup>④</sup>其所具有的不可违逆性,决定了政党执政规律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执政过程必须遵循的道理和程式。此种道理和程式关切的焦点实质上是政治学中的合

① 王金水、徐敏华:《中国共产党对于执政规律的探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72—73页,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③ 习近平:《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学习时报》,2009年11月16日。

④ 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1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法性范畴。从制度视角分析,“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sup>①</sup>。从执政维度研判,合法性是社会民众对执政者的内心认同和服从,在行动上表现为对执政党的拥护与支持。执政主体能否获得政权以及长期执政,取决于党执政的价值取向、执政要素的配置结构、执政模式以及彰显的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只有在正确的执政价值取向引领下,建构恰适的执政模式,形成强大的执政能力,获得优质的执政效果,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进而赋予执政的合法性,实现长期执政的预设目标。因此探究执政规律的核心要点是揭示促使民众对执政主体拥护和支持的诸种要素之间内在的、本质的、稳定的必然联系。

影响社会民众对执政主体掌控和运用公共权力的认同与服从的要素,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之所以成为执政规律的核心问题是由执政规律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人们探寻执政规律的意图虽然各不相同,但通过对执政规律的研究,实现长期执政或执政法定期限最大化,是研究者探索执政规律的共同目的。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或执政法定期限最大化,关键取决于社会民众对执政主体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的拥护与支持。拥护与支持是建立在执政主体所取得的执政绩效之上,在执政主体取得经济快速增长、文化繁荣发展、生态良性循环、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社会公平正义得以伸张的情势下,认同与服从执政主体掌握和运用国家公共权力的必然因素得以衍生,进而奠定实现长期执政和执政法定期限最大化的坚实基础。因此,通过对政党执政实践的分析,探寻出影响和制约社会民众对执政主体地位拥护和支持的诸多要素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是执政规律的核心问题,亦是研究执政规律的关键任务。有鉴于国体、政体、政党性质、执政生态的差异,在探究社会民众对执政主体拥护和支持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厘清如下差异,才能获得对政党执政规律的真理性认识。

首先,执政中的“政”的差异。国家公共权力的性质及类型不同决定了执政主体运作方式的差异,明确执政中的“政”是何种权力是探究执政规律的前提基础。一般而言,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判断执政的标志是政党是否获得了行政权,即政党通过合法程序掌控了政府的权力。因此,对现代西方国家而言,执政中的“政”仅指“行政权”。只要掌控了政府的行政权力,则意味着该政党就是执政党。在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不然,社会主义的性质、人民主权的特征、议行合一的政体等诸多特殊的制度结构和诉求,决定了执政中的“政”意指国家的政权,即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等在内的全部国家权力。此处的“政”并非一元的行政权,而是多元的全部公共权力。只有掌控了全部的国家权力,才标志着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进而受人民的委托以执政党的身份执政。对“政”剖析的结果差异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规律所追寻的是掌控和运用单一行政权必须遵循的道理和程式。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规律所探究的是掌握和运行全部国家权力所必须依照的内在规定性。就此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规律具有单一性和简明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规律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

其次,执政的法理基础差异。执政的法理基础主要体现为执政主体依据何种“法”获取执政地位及运用国家公共权力的问题。从经验的视角而言,在议会利益冲突中,通过非暴力斗争方式产生的政党,获取执政地位的依据主要是宪法、政党法等成文法律,在政党竞争中以选举获胜的方式取得对国家行政权力的掌控。因此,国家的宪法、政党法等成文法律构成了政党执政的法理基础。在无议会民主选举可资借用的情势下,通过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为使命而成立的政党,政党获取政权的主要手段是暴力革命,其建立新政权后获得执政的法理基础是自然法则或“惯

<sup>①</sup>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例法”。即“革命的胜利者,当然是新国家、新政权的组织者”<sup>①</sup>。这种自然法则或习惯法往往不以国家的成文法律形态而呈现,但却是“世界政治史证明了的铁的纪律”<sup>②</sup>。由于执政的法理基础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规律所探寻的是如何依照国家相关的成文法规,在政党竞争中获取多数选票成为执政党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获得最大的执政期限。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规律所追求的是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已成为执政党的前提下,如何通过执政模式的建构和执政绩效的提升等要素,增进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地位的拥护和支持。

再次,执政生态的差异。执政生态是指由国家性质、历史文化、社会基础等要素所形成的影响政党执政的环境系统。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丧失或巩固取决于执政生态的状况”<sup>③</sup>。因此,执政生态是考量政党执政规律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执政生态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必然会制约和影响政党执政规律的形成和作用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执政生态对政党执政规律的生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制度体系、自由至上的文化传统、以获取多数选票为主要使命的捐客政党性质、发达的社会组织等构成的执政生态,决定了其政党执政规律必然有别于其他执政生态之下的执政规律。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取向、国家权力相对集中的制度结构、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属性和“政党与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特征<sup>④</sup>,诸种要素所构成的执政生态系统必然衍生出具有鲜明个性和特色的执政规律。因此,在探索政党执政规律时,科学研判和分析执政生态是寻求政党执政规律真理性认识的重要因素。

最后,执政规律与轨迹的差异。执政轨迹是政党获取政权和运用国家权力所呈现的过程留痕。执政规律是揭示执政过程痕迹形成的必然性及其延伸执政过程最大化的内在逻辑。执政轨迹与执政规律两者既相互关联,又具有本质的区别。执政轨迹是政党执政过程的表象和执政规律的外在表现形态,归类为对政党执政观测的感性认识成果,是提炼、升华为执政规律的前提条件。未有对执政轨迹谱系的收集、比较和分析,就难以形成对执政规律研究的理性认识。执政规律是通过对执政轨迹现象剖析,认识构成长期执政或法定期限执政最大化的诸种要素之间内在必然联系的成果,是对执政轨迹认识的飞跃。基此而言,同样的执政轨迹背后具有不同的执政规律,同样的执政规律亦呈现不同的执政轨迹。因此,在探讨执政规律过程中,必须力避停滞在对执政轨迹的表象认识和因轨迹相似而萌生规律相同的思维误区。

##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究维度

如果说执政规律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促使客体对执政主体拥护和支持的各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那么就必须围绕制约和影响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拥护和支持的诸种要素的内在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历史文化的影响、党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渐进形成的社会基础等复杂因素,决定了探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需要从如下视角予以分析。

一是本质维度:执政主体的权力向权威的转化。对执政规律探索的本质在于通过揭示影响和制约构成规律的诸种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以最优的要素结构配置实现长期执政。决定中国

①② 赵向阳:《艰难的跋涉——政治体制与民主建设的曲折历程》,第41页,第4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徐玉生:《论执政生态及其对执政规律的解析》,《理论探讨》,2011年第1期。

④ 肖存良:《政党与社会的一体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甘肃理论学刊》,2013年第5期。

共产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掌和运用国家政权的拥护和支持,拥护和支持需要建立在客体对权力主体的认同与服从之上,由于权威被认为“是一种合法性权力”<sup>①</sup>,即人们内心对权力的认同和自觉服从,因此,人民群众对党掌握国家权力的认同与服从实质上就是权力向权威转化的问题。所以,如何推进权力向权威的转化是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重心所在。就国家公共权力而言,能否在运作的实践中及时地转化为权威是多种要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人民群众支持与否,人心的向背,是共产党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sup>②</sup>,也是促进党所执掌的国家权力转变为权威的关键因素。在对“人心向背”这一要素的剖析过程中,需要关切如下三个要点。

首先,长期执政的目标。西方政党执政的目标是法定期限的最大化,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是长期执政。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现实的社会基础、所要实现的宏伟目标决定了中国必须有一个强大政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无可比拟的强大领导力,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的不二选择。但此种执政不是法定期限的最大化,而是长期执政直至步入阶级和国家消失的共产主义。因此,实现长期执政的关键在于达成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长期拥护与支持,即持续地推进党所执掌的国家公共权力向权威的转化。所以,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挖掘、开发和科学配置促使人民群众拥护与支持的执政资源,使党所掌控的国家权力及时、持续地转化为治理权威,为实现长期执政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条件。

其次,认同的实现。执政地位获得拥护和支持的前提是对执政党的认同,实现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由认知向认同的转型,是党执掌的国家权力向权威转换的关键环节,更是探析党的执政规律不可或缺的要点。中国共产党如何将人民群众对执政现状的认知转化为认同并予以延续,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持久。需要指出的是,执政认同具有两种现象:一是客体基于执政主体掌握政权和运用政权所取得的良好绩效基础上的认可。此种认同可称为积极认同,其所形成的权威称为积极权威。二是客体基于对执政主体掌握国家权力的恐惧而产生的被动认可。如二战时期德国民众对希特勒与纳粹的认可,这种认同归属消极认同,其所形成的权威归结为消极权威。执政规律所指涉的认同属于前者,因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指导下,理性分析推进对执政行为由认知向认同转型的要素优化,依据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生态环境,科学设计驱动对执政认同的实践方案,形成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积极认同心理,实现党所掌控的国家权力向积极权威的转换,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重要内容。

最后,服从的达成。对执政主体的认同虽然解决了静态的执政前提基础,但实现对执政主体积极的主动拥护和支持,需要在权威影响下由认同向主动服从的动态转型。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追随和服从是建立在自身生存需要的基础之上。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生存作为第一需要的环境驱动的服从因素消失之后,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服从必然形成在新的基础之上,因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sup>③</sup>。生存的环境条件变化,人民群众的态度和选择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探索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主动服从和拥护的基础,发掘人民群众主动服从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要素资源,促进党执掌的权力不断地转化为执政权威,是厘清执政规律和实现长期执政的必备条件。

①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第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 曲青山:《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第542页,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37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二是价值维度:执政理念与目标。执政价值是政党为何种阶级和群体执政及其为什么执政的思想表达。不仅体现政党的性质,而且影响和决定着社会民众对政党执政的认同与拥护。因此执政价值是探讨政党执政规律至关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取向、奋斗目标和肩负的使命,决定了在研析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的过程中,需要注重两个问题。

其一,执政的价值取向。执政价值取向呈现为为什么执政或执政的意义,所要解决的是为谁执政和取得何种执政绩效的问题。马克思曾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sup>①</sup>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强调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sup>②</sup>。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党的执政事业,明确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sup>③</sup>。对上述党的执政价值取向分析,便于认知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的缘由和为实现长期执政在价值取向上必须秉持的原则,这些原则对推进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认同和服从具有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为从价值取向维度透视和把握党的执政规律开辟了渠道。

其二,执政的价值目标。执政的价值目标是指政党通过执政所要达到目的的具体表达,对社会民众拥护和支持执政主体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因此,执政的价值目标定位是否科学与精准,不仅关系到政党执政任务的能否完成,更涉及执政主体的信誉问题,进而影响政党执政的续存。所以,执政的价值目标是洞察政党执政规律十分重要的关键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sup>④</sup>,“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sup>⑤</sup>。此规定虽然未明确指出党的执政价值目标,但从党的长期执政融合分析,党的执政价值目标实质上就是通过执政实现共产主义。将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价值目标,对唤起人民群众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增强对党执政的拥护和支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因此,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探析和把握执政规律的另一重要维度。

三是模式维度:领导与执政复合下的三维执政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客观需要,决定了我们所探索的是人民群众对党长期认同与拥护的实现模式,而获得认同与拥护的重要因素取决于党在执政实践中所发挥的功能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结构功能理论告诉我们,功能决定结构,结构反作用于功能。结构是否合适,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功能的发挥。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视角,探析长期执政的规律是必然的维度选择。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特殊环境以及早期革命党的性质,铸就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新中国党具有集领导和执政于一体的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在新中国的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还是领导党。既要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sup>⑥</sup>,又要依法执政,为人民群众权益的实现执掌和运用国家政权。中国特殊的国情、党自身所肩负的多重任务、复杂的执政环境决定了党的长期执政规律的独特性。因此,从模式维度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必须关切如下要点。

第一,执政与领导的融合。执政是政党掌控国家公共权力并对公共权力的运用。其行为与国家权力具有必然的联系和强制的特征。领导是“组织或群体中的一些成员运用所拥有的权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3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47页,第28页。

④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66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⑤ 《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汇编》,第1页,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

引领其他成员实现组织或群体目标的过程”<sup>①</sup>。此处的“引领”主要通过影响力而实现,因此领导的本质是“影响”<sup>②</sup>,其活动与国家公共权力没有必然联系且不具有强制的特征。领导活动是否与国家公共权力相联系视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而定,当政党在国家中居于执政党地位时,领导活动与国家公共权力具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此时“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来实现的”<sup>③</sup>。当政党在国家中居于非执政地位时,此时的领导是通过理论的科学性、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党员个体的先进性而实现的,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鉴于中国共产党集执政与领导于一体的行为复合现象,必须从领导与执政的关系视角研析党的执政规律。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实现的。这一客观事实表明,在探寻党的执政规律时,需要研判在实施党的领导过程中,领导活动对构成执政行为各要素的影响、以领导活动增进执政绩效的路径和策略,进而获取通过领导促进执政水平提升的内在规律性。

第二,科学执政。科学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成功的前提条件。在执政模式的建构中,科学执政既是模式建构的指导思想,也是模式建构的具体形态。只有科学执政才能充分释放强大的执政功能,取得优质的执政绩效,为社会民众对执政主体的认同与服从供给丰富的资源,奠定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因此,通过党领导下执政的科学性透视党的执政规律,是走向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真理彼岸的重要通道。科学执政首先取决于执政模式的科学程度,执政模式的科学性具有相对性,在不同的执政生态下,具有不同的执政模式,判断执政模式科学与否的标准是该模式在执政实践中的有效性。科学执政其次取决于执政模式的创新性。在领导与执政两种行为同时作用和执政生态环境不断发展的情势下,执政模式必须及时地予以优化和完善,才能使执政行为产生良好的绩效。因此,将科学执政作为探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突破口,在领导与执政的互动下,以执政模式建构的科学性实现科学执政,是研究和掌握党的执政规律的重要路径。

第三,民主执政。民主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本质要求。因此,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民主执政的模式吸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保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权益是党执政的必然要求。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执政主体只有通过稳健有序的民主参与,充分吸纳、表达和实现执政客体的利益诉求,才能获取执政客体的拥护和支持,为实现长期执政奠定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民主执政是探究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的重要渠道。民主执政作为执政方式的一种形态,需要通过执政与领导复合行为下特定要素构成的执政模式才能实现。理念上秉持执政为民的思想。“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sup>④</sup>,形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民主执政的主观意识。实践上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依据“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sup>⑤</sup>的科学结论,动员和吸纳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活动,优化民主执政的实践方式。过程上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sup>⑥</sup>,将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贯穿于执政活动的始终。制度上将领导方式与执政模式统筹考量,以完整、系统、严谨的民主制度和程序规范党的领导和执政行为、人民群众的参与活动,保障民主执政的有序展开,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实现汲取更为广泛的民主资源。

第四,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其核心是依法用权。如果说

① 常健编著:《现代领导科学》,第1页,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张明军:《领导与执政:依法治国需要厘清的两个概念》,《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5期。

③ 《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112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⑥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法理基础是世界各国所认同的自然法则或惯例法,那么在取得执政地位后掌握并运用好人民赋予的国家公共权力,以获得执政的法理权威是其重要的使命。现代政党执政的实践表明,法理权威在多元权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提升法理权威是增进民众对执政主体认同与拥护,实现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因此,必须依据国家的法律,通过合法的程序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才能促进执政主体所掌握和运用的公共权力向权威的转化,增进客体对执政主体的拥护与支持。依法执政并非国家权力转化为权威的唯一要素,但却是进入现代之后权力转化为权威的最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客观上在建构执政模式时必须体现执政的依法性质,彰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sup>①</sup>,才能在执政中将国家权力规范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运行,力避公共权力脱轨对社会权利的侵扰,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为党的长期执政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积累更为丰富的资源。所以,依法执政是探析和把握党的长期执政规律极其重要的视角。

四是能力维度:执政能力现代化。执政能力是执政主体在执政过程中所呈现的运用国家权力配置发展要素和支配相应客体实现既定目标和任务的力量。执政能力的强弱是决定执政绩效优劣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展示执政主体魅力的核心要素。执政绩效的好坏和执政主体魅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社会民众对执政主体的拥护和支持,因此,探究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规律必须分析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是诸种要素交织作用而形成的对国家权力掌控和运用的力量,其重心在于执政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对执政能力现代化实现的考量,需要关注如下问题。

首先,权力的配置结构。如何依照国家宪法和程序配置公共权力及其运作的路径,是考量执政主体能力的首要环节。相对于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类国家权力,中国则有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和领导五类公共权力,前四类属于国家权力,最后的领导权属于党的权力。因此,从形式上分析,中国较之西方是更为分权的国家。但“党是领导一切的”<sup>②</sup>定位,决定了立法、行政、司法和监察四类国家权力统一于党的领导权之下,在实质上中国成了权力较为集中的国家。何种权力结构有利于提升执政能力并实现长期执政,取决于权力结构在该国政治实践中取得的实际绩效。因此,国家权力的分权化和集中化并非判断国家政治制度优越的唯一标准,更不是判别是否有利于长期执政的根本因素。判断国家权力结构配置的科学与否,取决于此种权力结构在该国能否有利于提升权力主体的执政能力以及执政绩效,无论是分权的结构还是相对集中的权力结构,只有能够提升执政能力并产生优质绩效的权力结构,对于该国而言才是最优的权力结构,同时亦是最有利于实现长期执政的权力结构。因为执政时限的长短在无法定限制的情势下,主要取决于社会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而社会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则主要来源于执政能力在何种权力结构下得以形成强大并在政治活动中展示出显著的成效。在西方三权分立且执政主要关注行政权的情势下,中国对国家权力的整体关切、形式上更为分权实质上较为集中的权力结构,经过改革开放中的日臻完善,在助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提升和执政绩效增长的基础上,佐证了此种权力结构对中国而言是优良的结构配置,也构成了支撑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获得社会民众拥护和支持的主要因素。因此,探析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规律,从权力结构的视角研判执政能力,进而通达执政规律的目的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其次,能力的内生性。执政能力的强弱固然是由诸如政党的凝聚力、前瞻力、先进性等要素共同形成的合力而决定的,但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极大地提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7页,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78页。

升了执政能力的内生性。此种由新技术带来的执政工具变迁,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执政的效能,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执政的思想理论,倒逼执政主体以新的执政理念建构执政方式,提升执政绩效,获取社会民众对执政主体的拥护和支持,为实现长期执政开辟新的执政资源。因此,考量执政规律必须分析执政能力的内生性问题。进入新时代后,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sup>①</sup>,需要党面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勇于自我革命”<sup>②</sup>,及时改进和优化执政方式,才能不断为自身的执政活动注入新的内生活力,“全面增强执政本领”<sup>③</sup>,为实现长期执政目标积聚强大的力量。

最后,执政行为模式的权变。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民众的诉求亦会产生新的变化,客观上必须及时变革执政行为方式,以新的执政功能不断满足社会民众的利益和诉求,才能为客体对执政主体的拥护和支持开发新的支撑资源。因此,探索政党的执政规律,需要从执政行为方式的权变出发,深刻分析社会环境变化所衍生的社会民众诉求的变革,以新的执政行为方式的建构,开发出持续的增进人民群众对执政主体支持和拥护的新生资源,才能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兼具执政与领导的双重使命决定了执政行为与领导活动的交织性,由此产生了执政方式与领导模式的交互叠加性。在分析执政行为方式权变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通过对执政轨迹的追溯和经验的总结提炼执政模式,更需要综合考量以领导方式的改进增强执政模式的效能问题,统筹创设执政行为模式与领导活动方式之间互动提升执政合力的方案,进而实现执政能力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下与时俱进的增长,为党长期执政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力量基础。

五是绩效维度:执政成本—收益的帕累托最优。执政绩效是执政主体在执政过程中所取得的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的成就。它也是展示执政能力、助推社会民众拥护和支持执政主体的直接资源。考量执政绩效不仅需要分析执政目标任务是否实现,更要关注实现目标任务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执政成本是政党为实现执政目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所消耗的物质和精神代价。以最小执政成本获取最大收益即执政成本—收益的帕累托最优,是执政绩效追求的价值取向,此种帕累托最优易于彰显执政主体的执政魅力,为执政主体获取法理上的认同奠定丰厚的认知资源。探析执政绩效需要从纵向时间和横向同类两个维度进行研判。纵向时间主要判断执政主体为实现执政目标所展示的成本—收益能力。横向同类主要判别执政主体为提升发展速度与同类发展水平国家的执政者相比所呈现的成本—收益水平。通过纵横执政绩效比较中所彰显的执政水平,获得社会民众对执政主体的支持和拥护,奠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因此,执政绩效是考察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的必然因素。中国共产党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sup>④</sup>,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sup>⑤</sup>为执政使命的政党。党的执政目标和使命决定了在分析执政绩效时需要同时关注两个主要因素。

其一,物质文化生态绩效。物质文化生态绩效是执政的最基础绩效,亦是社会成员提升生活水平的前提条件。物质文化生态绩效的高低直接体现着执政主体推进生产力发展,促进文化不断繁荣和生态良性循环水平的高低。以最小的成本获取物质文化生态发展最大收益的能力,对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因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sup>⑥</sup>。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注重生产力的发

①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8页,第53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0页。

④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页。

⑤ 曲青山:《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第40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49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展和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态诉求的提升,成功地实现了党的执政资源的新陈代谢,由改革开放前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取执政资源,及时地转化为在物质和意识形态等多元领域开拓新的资源。当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sup>①</sup>,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此种物质文化生态水平的显著增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文化生态事业的强大执政能力,为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地位的拥护和支持积蓄了坚实的物质文化资源。因此,物质文化生态绩效是剖析党长期执政规律的重要领域。

其二,政治社会绩效。物质文化生态绩效虽然是社会民众认同与拥护执政主体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必然导致社会民众拥护和支持的充分条件。因为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态资源在缺乏民主参与和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下,难以转化为对执政主体认同与服从的现实资源。所以,从执政绩效维度考量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规律,必须重视政治社会绩效在执政规律中的功能和价值。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始终注重政治社会绩效,致力于将“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sup>②</sup>,积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sup>③</sup>,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sup>④</sup>。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社会建设陷入动荡乃至崩溃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以积极稳健的发展模式,成功地实现了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政治社会建设最大的收益,为增进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拥护和支持赢得了深厚的政治社会资源。可见,政治社会绩效是分析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遵循的基本逻辑

政党的执政规律是在国家性质、政党性质、政党制度、执政生态等诸多要素交织作用下而形成的,这就决定了执政规律的稳定性和不可偏离性。在执政规律成为恒量,执政方式成为变量的情势下,则要求执政主体必须及时洞察执政环境的变迁,通过对规律遵循理念的科学定位、遵循核心的精准确立、遵循路径的科学选择和遵循方式的调适优化,为更好地遵循执政规律和实现长期执政开辟新局面。

第一,遵循的理念:尊重而非创设。规律所具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特征,决定了执政主体只可探究、发现、尊重执政规律,而不能根据自身的主观喜好和需求随意创设规律。执政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只能发现和遵守,任何创设执政规律的企图和行为必将因主观与客观的偏差而导致执政实践的挫折。因此,遵循的理念应该定位在尊重执政规律的基础上,依据执政生态的变化探究执政方式的变革,使遵循的基点始终定位在通过执政方式的完善,更加契合执政规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要求、更有利于执政能力的提升、执政绩效的增进、人民合法权益的实现和客体对执政主体拥护和支持的实现上。执政方式与执政规律之间是“术”与“道”的关系,“执政规律是‘道’,执政方式是‘术’”<sup>⑤</sup>。“道”的功能通过“术”而发挥,“术”的价值通过“道”而展示。在“道”成为恒量的前提下,只能通过变量“术”的优化,使执政活动符合执政规律的客观要求,产生更为显著的执政绩效,为政党执政获取社会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奠定雄厚的资源基础。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长期执政的目标,始终围绕人民群众对党执

①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页,第31页。

②④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6页,第27页。

⑤ 刘宗洪:《政党执政规律与党的执政方式现代化》,《探索》,2012年第5期。

政的拥护和支持这一主线,在科学研判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生态基础上,深入探究和遵循实现长期执政的基础条件、要素结构和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总结提炼出长期执政的真理性认识,为遵循长期执政规律提供思想指导。

第二,遵循的核心:实现人民对党执政的拥护与支持。鉴于执政规律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社会民众对执政主体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在遵循执政规律过程中,需要重点关切通过何种价值观的塑造、执政模式的建构、执政能力的展示、执政实践的优化和执政绩效的提高等催化社会民众对执政主体的拥护和支持,这是遵循党的执政规律必须聚焦的核心问题,也是贯穿遵循执政规律过程的一条主线。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政党与社会的一体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成功的秘密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础”<sup>①</sup>。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的政治目标,就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构政党与社会的一体化”<sup>②</sup>。在党融入和领导社会的进程中,使党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充分彰显,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改善民生福祉的绩效更加显著。政党与社会一体化重构的关键在于改进和完善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以恰适的领导模式填补党在基层社会执政的真空,实现党与人民群众的休戚与共。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党对社会的领导过程中,“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sup>③</sup>。为增进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拥护和支持奠定深厚的社会基础。

第三,遵循的路径:坚持从执政的实然基础到应然目的。执政规律是政党在执政实践中对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总结的理论升华。作为执政过程中内在的必然联系,具有需要坚持的共同价值、目标、原理和发展方向,这是任何执政规律必然体现的本质属性。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西方民主主义指导下的资产阶级政党,欲实现长期执政或执政的法定期限最大化,均需获得社会民众的拥护和支持等内在要求,这鲜明地体现了执政规律的应然性。此种执政规律的共性要求每一个政党必须清醒地体认到规律的刚性约束,沿着应然的轨道前行。实践证明,“政党的性质与政党对执政规律的把握没有直接关系”<sup>④</sup>,无论何种性质的政党,只有把握了执政规律,才能依照规律的要求采取恰适的执政行为,赢取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反之,对执政规律认识不清,甚至逆规律而行,最终必然失去民心,丧失执政地位。因此,在遵循规律的路径上,中国共产党首先明晰执政规律的共性,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sup>⑤</sup>,坚持不懈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sup>⑥</sup>，“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sup>⑦</sup>。如果说执政主体“获取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体现了执政规律的应然本质,那么执政主体以何种方式、工具和行为去获得社会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则需要从实然出发,在正确研判政党使命和执政生态的基础上,通过恰适的执政模式和策略设计,以实现民众对执政主体的支持和拥护。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实然国情,创设出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执政模式并获得显著的执政绩效,才能获得人民群众对党执政“拥护和支持”的应然目的。为此在遵循执政规律的过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实然,党需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①② 肖存良:《政党与社会的一体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甘肃理论学刊》,2013年第5期。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6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④ 曲青山:《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第3页。

⑤⑦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6页,第66页。

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2页,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sup>①</sup>,以权变的思维方式科学定位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政治道路与执政路径,才能沿着执政规律的刚性约束之路不断前行。

第四,遵循的方式:坚持执政规律真理性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如果说本质、价值、模式、能力、绩效维度的辨识解决了求索执政规律的真理性问题,那么,如何遵循真理性的执政规律则是需要实践予以回答的另一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任何真理均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矫正和完善。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遵循“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sup>②</sup>,实现执政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在实现两者统一的过程中,始终围绕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拥护和支持这一主线,要重点关切如下内容。

首先,领导与执政的互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双重功能决定了在执政实践中两种行为的重叠与规范性。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实现的,但领导的本质是影响则蕴含着党对国家机关实施领导的过程中,不是命令和支配,而是通过党的影响力,经过三个步骤实现领导活动与执政行为的和谐互动的。第一步是“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sup>③</sup>;第二步是“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sup>④</sup>;第三步是将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在党的领导影响下转化为高效的执行实践。三个步骤领导活动展示的是依法影响,执政行为体现的是依法用权,贯穿领导与执政的是法律法规对两种行为的规制。通过领导的影响提升执政的绩效,经由执政的用权增进领导的权威。

其次,党群关系的融合。在中国,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的关系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主要取决于党群关系的和谐融洽,因为“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sup>⑤</sup>。所以,必须秉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将“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sup>⑥</sup>的思想,转化为指导“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sup>⑦</sup>的执政实践,为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最后,执政规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执政实践既是探寻执政规律真理性认识的过程,亦是遵循规律指导执政行为的活动。因此中国共产党遵循执政规律的前提是:保证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具有真理性。真理的客观性要求党的执政规律理论必须接受执政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提升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摒弃执政规律认识中的非真理成分,使执政规律理论更具遵循的价值并据此更好地指导执政实践。真理的相对性要求党的执政规律理论随着时代的进步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创新,使执政规律理论契合新的执政环境特别是数字治理等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变化,保持执政规律理论真理的时效性,更好地发挥执政规律理论在新的执政环境中指导执政实践的功能,在党的执政规律理论与执政实践既相互统一又相互促进过程中,推进党遵循执政规律方式的不断科学化。

作者:张明军,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200030)

(责任编辑:阳军)

①⑤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8页,第66页,第66页。

②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③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8页,第18页,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⑦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2页。